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 & MODERNIZATION

一九九三年 ● 創刊号



(双月刊)

1993 年第 1 期

顾问

匡亚明

主编

张岱年

副主编

许逸民

责任编辑

刘石 张世林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编辑者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编辑部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出版者

中华书局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刊号 ISSN 1004—8618

CN 11—3175/G2

书号 ISBN7-101-01163-2/G·47

定价 4.00 元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

发刊词

在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

开幕式上的致词 李铁映(7)

“天人合一”新解 季羨林(9)

中国文化的新时代 张岱年(17)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家现代化 徐朔方(22)

论传统机制向现代的转换 张立文(28)

南朝高僧与儒学 唐长孺(38)

《司马光日记》考 李裕民(43)

古籍中的户口数:失望? 希望? 葛剑雄(50)

中国的古客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 汪珍如(54)

试论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 缪启愉(59)

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 李学勤(65)

古格王国的寺院艺术 金维诺(72)

一次成果喜人的会议

——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会议追记 李 岩(77)

●海外“中国学”

荷兰汉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上)..... [荷] 伊维德(79)

马清槐 唐 尧译

●书评

中华文化史上独辟蹊径的学术贡献

——记匡亚明教授主编的

《中国思想家评论丛书》..... 吴新雷(87)

编辑后记 (95)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No. 1, 1993

(A bimonthly)

Introduction to <i>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i>	(3)
A speech at the Third Conference on Programming the Classific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ncient Texts	<i>Li Tieying</i> (7)
“The Integration of Heaven and Man”: A New Interpretation	<i>Ji Xianlin</i> (9)
The New Era of Chinese Culture	<i>Zhang Dainian</i> (17)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i>Xu Shuofang</i> (22)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echanisms into Modern Ones	<i>Zhang Liwen</i> (28)
Eminent Monks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Confucianism	<i>Tang Changru</i> (38)
An Examination of <i>Sima Guang’s Diary</i>	<i>Li Yumin</i> (43)
Household Figures in Ancient Texts: Disappointing or Encouraging?	<i>Ge Jianxiong</i> (50)
Ancient Records Concerning “Guest Stars” in China and Modern Astronomy	<i>Wang Zhenru</i> (54)
Preliminary Views 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Its Modernization	<i>Miao Qiyu</i> (59)
On Newly Excavated Bamboo Slips and Silk Pieces, and Related Academic Studies	<i>Li Xueqin</i> (65)
Temple Art from the Kingdom of Gubei	<i>Jin Weinuo</i> (72)
The Third Conference on Programming the Classific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ncient Texts—A Retrospective Report	<i>Li Yan</i> (77)
● Sinology Abroad	
Sinology in Holland (I)	<i>Iderma</i> (79)
● Book Review	
Professor Kuang Yaming (Chief Editor): <i>A Series of Critical Biographies of Chinese Thinkers</i>	<i>Wu Xinlei</i> (87)
Editors note	(95)

(冯世则译)

发 刊 词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号和读者见面了。这是经过一番认真酝酿和准备的结果。早在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期间(1992年5月),就有不少学者建议,为了贯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公布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一步作深入探讨,小组应该主持创办一个理论性、学术性的定期刊物,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后来,学习了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所作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先进的精神文明。”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我们将本刊定名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一个深刻变化的伟大时代,一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迈得更快更大的欣欣向荣的时代。在这样催人奋进的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就显得更为必要。正如李铁映同志在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开幕式上所说:“今天,当我们处在加速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时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党一贯主张,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走向胜利的决定性保证。这个具体实际的内涵之丰富、复杂,是无与伦比的。但有一点应予高度重视,即中国所独具的历史悠久、内容广博的传统思想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我们党历来所强调的。方向已经明确,问题在于认真实现。我们

应把党中央提出的“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这一英明号召变成现实。这就需要对下述三个问题作些简要说明：

(一)我们所以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等杰出的革命思想家,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这三个领域的发展规律和前人对这些规律的论述,作了大量研究和分析,从而以崭新的面貌,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即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个哲学体系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主要表现在一个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即客观存在的世界,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性的。在哲学上前者属于唯物主义,后者属于唯心主义。但唯物主义哲学并不否认唯心主义哲学在某些具体领域中的成就,例如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哲学中有关辩证法的论述,就表示了热情欢迎和肯定的态度。因此,我们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同时,也欢迎和肯定在此领域中其他一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历经数千年发展和积累过程而形成的。其中既含有积极因素即精华,也含有消极因素即糟粕,这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全面肯定,不对;全面否定,也不对。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是经过研究分析,肯定其积极因素,清除其消极因素,即认真清理,区别对待的态度。这三种态度,前两种已非主流,后一种也已逐渐成为共识。这是好现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除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一般性考证和论述外,更重要的是着力于具体阐明和论证哪些是属于积极因素,有利于促进当前改革开放,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哪些是属于消极因素,对改革开放,对当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事实上,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往往互相混杂,必须细心研究和清理。只有逐步理顺和讲明了这些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巨大作用和意义的论断,才更有发人深思的说服力,继承和弘扬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我们相信,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这个刊物也将克尽自己在这方面的职责。

(三)中国优良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主要靠三个层面的系统工作来实现,一是古籍(包括出土文物)的整理出版,二是对古籍(包括出土文物)的系统研究,三是把研究的精确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使之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三者既密切联系,相互促进,又各有特点,各有自己的专业性课题。就各自存在的特有意义而言,三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例如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看来不难,其实不易。古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没有此载体,继承和弘扬就无从说起。据估计中国古籍约八万种。这样大量的古籍,是世界之最。加以整理出版,使人看得明,读得懂,确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至于从事整理工作的专业人员,没有一定的语言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语法)、文献学(包括版本、目录、校勘、考据)、考古学等等的基本训练,是很难胜任的。它本身就是学术工作,或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专业性工作。没有完备的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就要大大影响学术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造成延缓以至停顿(如孤本、珍本无法找到等)。又如古籍的学术研究工作,是使整理出版后的古籍,不仅是书架上的陈列品,而且成为活生生的精神财富,使之在各条战线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服务。由于体现在古籍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极其广博的领域,几乎所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内容,诸如哲学、历史、文物、文学、艺术、宗教、医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农林、水利、建筑、冶炼等,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有所反映。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后,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既然中国古代如汉、唐、宋、明时代,都曾有过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其中就必然有适应于当时水平和形态的高科技。这不是寻求安慰,而是坚定信心;古人能做到的,今人也能做到;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必能做到。在传统文化中探索古代科技的轨迹,必将大大拓宽古籍研究的视野。现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精干的古籍研究人员,他们既要有高度的古文献知识,又要有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还要熟知现代科学技术的意义与作用,坚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前景等等,才

能够把古籍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作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又如将学术研究的积极成果引入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使之既经受检验又得到发展,这将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工作,没有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做到做好的。经过以上三个层面的系统工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加上各方面工作的配合,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外古今之长,创造出先进的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本刊有志于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的刊物诞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任重而道远。我们在强调学术性和理论性的同时,也还希望它能够办成一个内容宽泛灵活、形式活泼多样的“杂”志。我们竭诚欢迎海内外学者对我们的工作惠予支持和指教。

在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

(1992年5月25日)

李 铁 映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了。这是继1962年、1982年两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家、学者的又一次盛会。我代表国务院向与会专家、学者致以亲切问候，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举世无伦、光辉灿烂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当我们处在加速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时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更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脱离包含历史传统在内的国情和民情。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着许多精华，可以直接、间接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利用或借鉴。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并从中吸取营养，这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振兴中华，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古籍，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

富,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古籍,也就没有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了。因此,整理出版古籍,确是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前提。此外,古籍整理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就是通过抢救、挖掘、整理、出版、研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无价之宝保存下来,完善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是两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工作。学术研究离不开可靠的文献古籍,整理古籍离不开对古文献本身的研究,其最终目标,还是为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为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服务。

正因为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和国家历来就十分重视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古籍的整理出版。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建国后,1958年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于“文革”的干扰,使小组工作陷于瘫痪。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提出的要恢复和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成立了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在则是第三届了。

为了进一步搞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首先,必须调动和发挥全国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和地方各有关部门,都应该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都来关心这项工作,并切实地从各方面给以大力支持。第二,需要有一批自愿献身这项事业的专家、学者。因此,要不断发现和培养人才,力求做到既出成果,又出人才,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代有传人。第三,要提倡和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本着对学术、对人民、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不断提高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质量。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制订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我希望大家对小组起草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讨论稿)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尽所欲言,力求经讨论修改后,使之成为一个较好的稿本。我相信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后,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大家。

“天人合一”新解

· 季羨林 ·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外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哪一个也回避不开。但是，对这个命题的理解、解释和阐述，却相当分歧。学者间理解的深度和广度，理解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这是很自然的，几乎没有哪一个哲学史上的命题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

我在下面先简略地谈一谈这个命题的来源，然后介绍一下几个有影响的学者对这个命题的解释，最后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新解”吧。对于哲学，其中也包括中国哲学，我即使不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站在哲学门外向里面望了几眼的好奇者。但是，天底下的事情往往有非常奇怪的，真正的内行“司空见惯浑无事”，对一些最常谈的问题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而外行人则怀着一种难免幼稚但却淳朴无所蔽的新鲜的感觉，看出一些门道来。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很容易解释，在人类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并不罕见。我希望，我就是这样的外行人。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命题的来源和含义。

什么叫“天人合一”呢？“人”，容易解释，就是我们这一些芸芸众生的凡人。“天”，却有点困难，因为“天”字本身含义就有点模糊。在中国古哲学家笔下，天有时候似乎指的是一

个有意志的上帝。这一点非常罕见。有时候似乎指的是物质的天，与地相对。有时候似乎指的是有智力有意志的自然。我没有哲学家精细的头脑，我把“天”简化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我相信这八九不离十，离开真理不会有十万八千里。这对说明问题也比较方便。中国古代的许多大哲学家，使用“天”这个字，自己往往也有矛盾，甚至前后抵触。这一点学哲学史的人恐怕都是知道的，用不着细说。

谈到“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来源，大多数学者一般的解释都是说源于儒家的思孟学派。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理解。《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这是很有见地的话，这是比较广义的理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现在就根据这个理解来谈一谈这个命题的来源，意思就是，不限于思孟，也不限于儒家。我先补充上一句：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为了方便起见，我还是先从儒家思想介绍起。《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

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境界。

孔子对天的看法有点矛盾。他时而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不言而四时行，而万物生。他时而又认为，人之生死富贵皆决定于天。他不把天视作有意志的人格神。

子思对于天人的看法，可以《中庸》为代表。《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孟子对天人的看法基本上继承了子思的衣钵。《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天命是人力做不到而最后又能使其成功的力量，是人力之外的决定的力量。孟子并不认为天是神；人们只要能尽心养性，就能够认识天。《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是当时儒家的代表。是他认真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天人感应说，有时候似乎有迷信色彩，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

到了宋代，是中国所谓“理学”产生的时代。此时出了不少大儒。尽管学说在某一方面也有所不同。但在“天人合一”方面，几乎都是相同的。张载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

宋以后儒家关于这一方面的言论，我不再介绍了。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思想不限于儒家。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把“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那么在儒家之外，其他道家、墨家和杂家

等等也都有类似的思想。我在此稍加介绍。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说：与自然无所违。《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看起来道家在主张天人合一方面，比儒家还要明确得多。墨子对天命鬼神的看法有矛盾。他一方面强调“非命”、“尚力”，人之富贵贫贱荣辱在力不在命。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天志”、“明鬼”。他的“天”好像是一个有意志行赏罚的人格神。天志的内容是兼相爱。他的政治思想，比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也有同样的标记。至于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应同》中说：“成齐类同皆有合，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高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这里又说：“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吕氏是主张自然（天）是与人相应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介绍这样多。我不是写中国哲学史，不过聊举数例说明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十分普遍而已。

不但中国思想如此，而且古代东方思想也大多类此。我只举印度一个例子。印度古代思想派系繁多。但是其中影响比较大根柢比较雄厚的是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印度使用的名词当然不会同中国一样。中国管大自然或者宇宙叫“天”，而印度则称之为“梵”（brahman）。中国的“人”，印度称之为“我”（Ātman，阿特曼）。总起来看，中国讲“天人”，印度讲“梵我”，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印度古代哲学家有时候用 tat（等于英文的 that）这个字来表示“梵”。梵文 tatkartr̥。表面上看是“那个的创造者”，意思是“宇宙的创造者”。印度古代很有名的一句话 tat tvam asi，表面上的意思是“你就是那个”，真正的含义是“你就是宇宙”（你与宇宙合一）。宇宙，梵是大我；阿特曼，我是小我。奥义书中论述梵我关系常

使用一个词儿 *Brahmātmaikyam*,意思是“梵我一如”。吠檀多派大师商羯罗(*Śaṅkara*,约公元788—820年),张扬不二一元论(*Advaita*)。大体的意思是,有的奥义书把“梵”区分为二:有形的梵和无形的梵。有形的梵指的是现象界或者众多的我(小我);无形的梵指的是宇宙本体最高的我(大我)。有形的梵是不真实的,而无形的梵才是真实的。所谓“不二一元论”就是说:真正实在的唯有最高本体梵,而作为现象界的我(小我)在本质上就是梵,二者本来是同一个东西。我们拨开这些哲学迷雾看一看本来面目。这一套理论无非是说梵我合人,也就是天人合一,中印两国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请参阅姚卫群《吠檀多派哲学的梵我关系理论》,《南亚研究》1992年第三期,页37—44)

从上面的对中国古代思想和印度古代思想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使用的名词不同,而内容则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我个人认为,这种思想是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而且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

专就中国哲学史而论,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到:哪一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也回避不开“天人合一”这个思想。要想对这些学者们的看法一一详加介绍,那是很难以做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我在下面先介绍几个我认为有代表性的哲学史家的看法,然后用比较长一点的篇幅来介绍中国现当代国学大师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他的意见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首先介绍中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冯芝生(友兰)先生的意见。芝生先生毕生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等身,屡易其稿,前后意见也不

可避免地不能完全一致。他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皇皇巨著,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过程中,随着时代潮流的变换,屡屡改变观点,直到逝世前不久才算是定稿。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那许多版本的异同。我只选出一种比较流行的也就是比较有影响的版本,加以征引,略作介绍,使读者看到冯先生对这个“天人合一”思想的评论意见。我选的是1984年中华书局版的《中国哲学史》。他在上册页164谈到孟子时说:“‘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等语,颇有神秘主义之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简略,不能详也。”由此可见,冯先生对孟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没有认真重视,认为“有神秘主义倾向”。看来他并不以为这种思想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其他意见不再具引。

第二个我想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他在《中国思想通史》(1957年,人民出版社)第一卷,页380,谈到《中庸》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引用了《中庸》的几段话,其中包括我在上面引的那一段。在页381侯先生写道:“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在西周的宗教神上面加上了一层‘修道之谓教’。”看来这一位中国思想史专家,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与欣赏水平,并没能超过冯友兰先生。

我想,我必须引征一些杨荣国先生的意见,他代表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御用哲学家的意见。他是十年浩劫中几乎仅有的一个受青睐的中国哲学史家。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1973年,人民出版社)可以代表他的观点。在这一部书中,杨荣国教授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关的古代哲学家一竿子批到底。他认为孔子“要挽救奴隶制的危亡,妄图阻止人民的反抗”(页25)。孔子的“政治立场的保守,决定他有落后、反动的一面”(同上)。对子思和孟子则说,“力图挽救种族统治、把孔子天

命思想进一步主观观念化的唯心主义哲学”。(页29)“孟子鼓吹超阶级的性善论”。(页34)“由于孟子是站在反动的奴隶主立场,是反对社会向前发展的,所以他的历史观必然走上唯心主义的历史宿命论”(页35)。“由是孔孟之道更加成为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要彻底砸烂这些精神枷锁,必须批判孔孟哲学,并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页37)。下面对董仲舒(页74—84),对周敦颐(页165—169),对程颐(页171—177),对朱熹(页191—198)等等,所使用的词句都差不多,我不一一具引了。这同平常我们所赞同的批判继承的做法,不大调和。但是它确实代表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潮,读者不可不知,所以我引征如上。

最后,我想着重介绍当代国学大师钱穆(宾四)先生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看法。

钱宾四先生活到将近百岁才去世。他一生勤勤恳恳,笔耕不辍,他真正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著作等身”,对国学研究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涉猎方面极广,但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为轴心。因此,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在他那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著述中,很多地方都谈到了“天人合一”。我不可能一一列举。我想选他的一种早期的著作,稍加申述;然后再选他逝世前不久写成的他最后一篇文章。两个地方都讲到“天人合一”;但是他对这个命题的评价却迥乎不同。我认为,这一件事情有极大重要的含义。一个像钱宾四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在漫长的生命中,对这个命题最后达到的认识,实在是值得我们非常重视的。

我先介绍他早期的认识。

宾四先生著的《中国思想史》(《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一辑)中说:

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乃在其不主向外觅理,而认真理即内在于人生界之本身,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者共同者而言,此可谓之内向觅理。

书中又说:

中国思想,则认为天地中有万物,万物中有人类,人类中有我。由我而言,我不啻为人类中心,人类不啻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我又为其中中心之中心。而我之与人群与物与天,寻本而言,则浑然一体,既非相对,亦非绝对。

在这里,宾四先生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没有加任何评价。大概他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思想有什么了不起之处。

但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宾四先生在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1991年八月第四期,页93—96)中,对“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有了全新的认识。文章不长,《中国文化》系专门学术刊物又不容易见到,我索性把全文抄在下面:

〔前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适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

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类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天“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

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生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生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运,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

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以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以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义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想。

我抄了宾四先生的全文。此文写于1990年五月。全抄的目的无非是想让读者得窥全豹。我不敢擅自加以删节,恐失真相。

我们把宾四先生早期和晚期的两篇著作一对比便发现,他晚年的这一篇著作,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大大地改变了。他自己使用“澈悟”这个词,有点像佛教的“顿悟”。他自己称此为“大体悟”,说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又说“此事涵义广大”,看样子他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当然都非常希望知道,这“澈悟”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可惜他写此文以后不久就谢世,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谜。宾四先生毕生用力探索中国文化之精髓。积八十年之经验,对此问题必有精辟

的见解,可惜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他在此文中一再讲“人类生存”。他讲得比较明确:“天”就是“天命”;“人”就是“人生”。这同我对“天”“人”的理解不大一样。但是,他又讲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把“天”与“自然”等同,又似乎同我的理解差不多。他讲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认为“欧洲文化近于衰落”,将来世界文化“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这一点也同我的想法差不多。

宾四先生往矣。我不揣鄙陋,谈一谈我自己对“天人合一”的看法,希望对读者有那么一点用处,并就正于有道。我完全同意宾四先生对这个命题的评价:涵义深远,意义重大。我在这里只想先提出一点来:正如我在上面谈到的。我不把“天”理解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为“人生”;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来在这一点上我同宾四先生意见是不一样的。

我怎样来解释“天人合一”呢?

话要说得远一点,否则不易说清楚。

最近四五年以来,我以一个哲学门外汉的身份,有点不务正业,经常思考一些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思考与宾四先生提出的“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的问题。我先在此声明一句:我并不是受到宾四先生的启发才思考的,因为我开始思考远在他的文章写成以前。只能说是“不谋而合”吧。我曾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我的想法,在许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也发表了一些讲话。由最初比较模糊,比较简单,比较凌乱,比较浅薄,进而逐渐深化,逐渐系统,颇得到国内外一些真正的行家的赞许。我甚至收到了从西班牙属的一个岛上寄来的表示同意的信。

那么,我是如何思考的呢?

详细的介绍,此非其地。我只能十分简略地介绍一下。我从人类文化产生多元论出发,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不管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

一、中国文化

二、印度文化

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

四、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

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

现在我回到本题。“天人合一”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我理解的“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我现在就根据这个理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一些分析。

人,同其他动物一样,本来也是包括在大自然之内的。但是,自从人变成了“万物之灵”以后,顿觉自己的身价高了起来,要闹一点“独立性”,想同自然对立,要平起平坐了。这

样才产生出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在成为“万物之灵”之前或之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取给于大自然,衣、食、住、行,莫不皆然。人离开了自然提供的这些东西,一刻也活不下去。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关系之密切、之重要。怎样来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勉强满足了他们的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昏昏然自命为“天之骄子”,“地球的主宰”了。

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炼的表述。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占过上风,起过导向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三十年河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时移势迁,沧海桑田。西方文化取而代之。钱宾四先生所说的:“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这就是我所说的“三十年河西”。世界形势的发展就是如此,不承认是不行的。

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人不能把其他动物都视为敌人,要征服它们。人吃一些动物的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古至今,东方的一些宗教,比如佛教,就反对杀牲,反对肉食。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对鸟兽表示同情的表现,

在在皆有。最著名的两句诗：“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对鸟兽表示出来的怜悯与同情，十分感人。西方诗中是难以找到的。孟子的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表现了同一种感情。

东西方的区别就是如此突出。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后果严重。对人类的得寸进尺永不满足的需求，大自然的忍耐程度并非无限，而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以内，它能够满足人类的某一些索取。过了这个限度，则会对人类加以惩罚，有时候是残酷的惩罚。即使是中国，在我们冲昏了头脑的时候，大量毁林造田，产生的后果，人所共知：长江变成了黄河，洪水猖獗肆虐。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

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西方的有识之士，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直到最近，已经感到西方文化行将衰落。钱宾四先生说：“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他的忧虑同西方眼光远大的人如出一辙。这些意见同我想的几乎完全一样，我当然是同意的，虽然衰落的原因我同宾四先生以及西方人士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的。

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依我

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有一位语言学家讽刺我要“东化”。他似乎认为这是非圣无法大逆不道之举。愧我愚陋，我完全不理解：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决不应妄自尊大。但是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不当囿于积习，鼠目寸光，认为西方一切都好，我们自己一切都不行。这我期期以为不可。

多少年来，人们沸沸扬扬，义形于色，讨论为什么中国自然科学不行，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都认为这是一件事实，不用再加以证明。然而事情真是这样吗？我自己对自然科学所知不多，不敢妄加雌黄。我现在吁请大家读一读中国当代数学大家吴文俊先生的一篇文章：《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四期）。大家从中一定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总之，我认为，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有不少好东西，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去发扬光大。“天人合一”就属于这个范畴。我对“天人合一”这个重要的命题的“新解”，就是如此。

1992. 11. 22写毕